

# 新闻业务

XINWEN YEWU

活叶版

17

总 1626 期

1979年4月25日

新华通讯社编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 目 录

可喜的突破·····	章挺权 (1)
美国记者在北京如何采访中美建交·····	叶志雄 (4)
美记者评论我社报道·····	叶志雄 (6)
措词不妥 应当注意·····	吕叔湘 (7)
要仔细推敲·····	赵昌春 (8)
记一次采访·····	柳 毅 (9)
肃清“帮八股”流毒何其难·····	丁世义 (11)
继续沿用“第几次、第几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是否恰当·····	(12)

## 可 喜 的 突 破

章 挺 权

去年十二月对外部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了对中美建交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反应报道。

这是对外宣传会议以后在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方面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从外国通讯社和外国报刊采用的情况来看，这无疑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多年来，由于长期受着林彪、“四人帮”所设置的条条框框的束缚，我们在写政治反应报道时，总是按照老框框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在去年八月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我们组织了北京和外地各界知名人士的反应，每个人使用的语言，仍然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不断重复。

是不是像外国专家批评那样，我们写这类报道只能是一般化，甚至只会说些“白痴语言”呢？是不是新华社发的这类报道都是无人问津呢？

回答是：不尽然。

先举一例：

题：北京群众说：这是“好消息”（对外广播稿译文）

新华社北京十二月十六日电（北京时间十五点发出）“好消息！”“大好事！”

这是新华社记者今天从北京街头脸露笑容的老百姓那里听到的反应，他们都热烈欢迎中美两国宣布建交的新闻。

《人民日报》社今天用红色印刷了一百万份《号外》，在一个小时内就被街头群众一抢而光。十辆满载《号外》的大轿车驶遍全城，并把中美建交的消息传到近郊农民。

负责《号外》排版的四十五岁的排字工人贾昆，在排完最后一行字时，高兴地对新华社记者说：“这就是历史。这是中国人民所希望的，我相信也是美国人民所希望的。”

贾昆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诞生时起就当印刷工人。他对记者说：“建交，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

年轻的人民解放军战士潘友生在西单闹市区大街上仔细读完《号外》后，脸上堆满了笑容。他对记者刚说了一句“挺好”，手中的号外就被别人夺走了。

正在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游览的一位来自郑州的中年人王喜运，刚打开收音机听华主席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实况转播，身边就围上了一堆听众。他说：“昨天我瞻仰了毛主席遗容，今天又听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消息。毛主席的遗愿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实现了。”

当北京时间十点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从北京火车站的各个广播喇叭传出以后，喧闹的候车室突然安静下来。候车室里一位正在下棋的旅客对他的对手说：“即使这盘棋让你赢了，今天仍然是了不起的一天。”

正在西单看大字报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伯钧抢到一份《号外》以后，就把消息高声朗读给大家听。他对记者说，他当过英语教员，现在是心理专业的学生。“如果今后有机会，我愿到美国学习。”

这篇报道不长，全文只有八百字，播出以后，立即受到四大通讯社的重视。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全文加以转播。路透社和法新社驻京记者引用了其中最吸引人的几个段落。美联社除全文转播外，还在另一篇评述新闻中引用了其中大部分材料，同台湾蒋经国的反应作了生动的对比。据初步了解，美国的《新闻周刊》和一家地方报纸采用了这篇报道，或引用了其中的材料（因无其他美国报纸，无法了解更多情况）。

对外部采写这篇报道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五位同志按照预定计划分别来到北京火车站、王府井和《人民日报》社，天安门广场和西单。据事先了解，《人民日报》社应该在上午十点钟开始在这些地点散发《号外》，但是那天到上午十一点半我们离开《人民日报》社时，《号外》还没有印出，街上的群众对这样的重大事件仍然一无所知。只有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的旅客从广播喇叭中听到了广播，从外地到天安门广场游览的个别旅客碰巧打开收音机收听了广播，成了采访的对象。

中美两国宣布建交，是震撼世界的大事。对于这样的大事，普通的中国人有何反应，这也是为世人所关心的。英国每日电讯报的韦德和一些其他外国记者在华主席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不久就到街上去采访，完全说明了这一点。还必须指出，塔斯社也派了几名记者在十多钟来到了《人民日报》社大门口。

因此，如果新华社不及时报道群众的反应，国外有可能会以为中国群众对这件大事漠然

置之。能不能又快又好地发出第一条反应，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就是政治。

在对外宣传会议上，李普同志代表党组提出了怎样起步向世界性通讯社前进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必须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做起。

对外部同志在这次采访中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当外国记者还在街上采访时，我们就回到了社里。没有顾上吃饭，只用二十多分钟时间，就把中文稿写了出来，接着又用不到三十分钟，就把英文稿写好了。由于英文大广播要到下午三点钟才开机，稿子虽然早已写好，也只好等到下午三点发出。

对外部的专家认为这条稿子应及时发出，因为它具备了三个因素：一，它反映了中美建交是得到普通中国人欢迎的；二，它说明了这也是美国人民所需要的；第三，它说明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已经得到了实现。

但是，对这条稿子也有不同的看法。当稿子送审时，几乎要被“枪毙”了，只是由于记者同志坚持要发，才救了它的“命”。

不同意发这条稿子的同志认为：一，稿子太单薄，要补充材料；二，有些例子（如火车站下棋）没有意思。

习惯于看过去国内报纸上登载的那种反应报道的同志，看了这篇报道以后，是会产生“单薄”之感的。因为过去的报道都是长篇“巨著”，这篇那么短怎么行呢？在过去写反应报道时，总要通过许多“他们说”（其实都是记者自己说）来重复领导人、社论或文件中的语言，以显示稿件的“份量”和记者的“高明”。其实，这些所谓“有份量”、“高明”的话，却被我们的读者斥之为“陈词滥调”、“八股调”。对外部这篇稿子，好就好在它抛弃了这些东西，突破了框框，代之以群众自己说的真心话、生动的话。

那么，为什么被认为“单薄”、“没有意思”的稿子能引起外国记者、编辑和读者的兴趣呢？我认为这正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新闻的特点，二、新闻敏感。而在这篇稿件里，这两个问题又是互相联系的。对外部的同志坚持保留这些例子，有几点理由：一、过去新华社的报道，由于长期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空话、假话、套话很多，已经在读者中失去了信誉。现在对外部这篇稿件是引用了火车站下棋和西单看大字报（新华社从来没有提过）等例子，使他们看了感到报道很真实，而这正是新华社在国外读者中间建立信誉的必要前提；二、对于中美建交的大事，我们官方的反应，当然是他们所预料的，知名人士的反应，也是他们所预料的（如黄镇、王炳南的反应，可能因为没有谈出什么新话，外电没有转播）。除非有人象美国的戈德华特那样说他反对中美建交，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中国的普通群众到底有什么看法，则是他们很关心的。

新闻的时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批判抢新闻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说什么强调“短、快、多”是“修正主义”新闻观点。但是，对外部这篇报道之所以受到重视，采用率高，就是因为它发得快，发得及时，抢到驻京外国记者的前头。如果求全求大，一直要拖到半夜才发出（过去都是这样的），等到外国记者都报道了，那还有多少新闻价值！

社党组已经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口号。我认为提得非常及时，非常正确。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得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地做起，就得按通讯社的规律办事。

外国通讯社在报道世界各地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时，数量多，速度快。他们对每篇稿件并不要求全面。如在报道参议员戈德华特的反应时，美国通讯社发了很多条，其中有一条只有一段话，就是他批评卡特的行动是“怯懦行为”那一段。

对外部的这次报道只能说是一个“尝试”，还有大大改进的余地，还有一些框框要打破，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如在发了这篇报道以后，对外部还应该连续再发一篇到两篇群众的反应，而对外部没有这样搞。又如，对外部有的同志原先提出采访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即使只讲一两句也是一条新闻，但是领导上不敢做。在这一点上，中央电视台比我们解放思想，采访了他，作了报道，引起了国外的注意。

## 美国记者在北京如何采访中美建交

叶志雄

中美建交前夕，美联社特派记者罗德里克，偕同该社亚洲图片主编乌莱维奇来华采访。他们不辞辛苦，紧张工作，罗访华二十二天，差不多每天都向东京分社发稿，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条。

### （一）“下车伊始”就紧张工作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飞机误点，他们在四时五十八分才到达北京。当得知首都新闻界除夕招待会将于五时举行时，年近六十五岁的罗德里克立即决定，不到旅馆休息，直接去参加招待会。会上，他见到了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和各国驻京记者，还见到了他在延安时结识的老朋友。他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友好坦率、畅所欲言的“延安气氛”又回来了。他还说，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告诉他，“现在新华社的报道信得过了”。他还见到李普同志，表达了争取尽快在北京设分社的愿望。到旅馆用晚饭时，他和我陪同人员谈到中美关系、中国政局和国际形势，并提了些问题。当晚，他用长途电话通过东京总分社发了第一条消息。

乌莱维奇在飞机上了解到，同机到达的有来华帮助建设加速器的芝加哥美籍华人物理学家邓昌黎教授。他一下飞机就拍摄了邓在北京受到欢迎的场面，当晚即用传真发回。

一个记者应该有罗德里克这种“下车伊始”就开始工作的精神。要争取一切机会、利用一切时间、条件进行采访。

### （二）报道思想明确

罗德里克的具有高度的新闻敏感，要抓的问题很明确：

（1）中国怎样从全球战略来看待中美关系，中国政府“和平统一”台湾的诚意如何，对统一的方式和步骤有何设想，今后中美关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2）“四人帮”怎样干扰破坏，造成多大损失，他们不得人心到什么程度？目前揭批“四人帮”运动是否确已告一段落，不断有来京上访人员说明什么，总的说来政局是否安定团结，中央党政领导是否稳定？当前就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展开讨论有什么含义和影响？

（3）中国搞四个现代化的努力。

（4）中国搞“民主化”能到什么程度，加强法制有多大决心？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采访活动，他对上述几个问题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报道奠定了基础。

### （三）善于提问，善于表达

这不只是采访和写作（拍摄）技巧的问题。罗德里克提问往往紧扣主题，又能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而异。他提问时，往往是问题一个接一个，轻松随便，风趣，幽默。他在故宫偶遇纺织工业部一年轻女同志，就问今后中国衣料和式样将发生多大变化？见到山东外办主任，他问为什么不断有山东人去北京上访。在胜利油田，他向当地一位年轻而单纯的翻译打听油田面积、地质结构和藏量等一般不对外讲的情况。见到油田某钻井队指导员，他又问：

“你认为白猫黑猫理论对吗？”当指导员回答说：“我们技术还落后，愿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装备”时，他满意地称赞说：“你回答得太高明了！”

谈到善于表达，不妨看看乌莱维奇拍摄的一些照片：民族饭店内以毛主席诗词《鸟儿问答》的屏风为背景的圣诞树——按他的说法这表明中国向西方开放，联合对付苏联；山东淄博市郊农村的老牛车和拖拉机在公路上并驾齐驱；北京大栅栏百货公司时装展览；男女青年在关闭多年的北海公园内手挽手滑冰；友谊宾馆内中国人跳交谊舞；北京歌舞团演出古典独舞《春江花月夜》；济南街头的英国电影《百万英镑》和美国电影《摩登时代》的广告。

### （四）有一股“钻”劲

采访、表达都得靠真功夫，靠平时钻研。罗德里克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是相当熟悉的，提到大庆英雄“王铁人”、“四人帮”御用工具“梁效”以及所谓“社来社去”等，他都懂。离开北京前一天下午原拟休息，他却独自去看中国通史展览。

乌莱维奇则利用一切机会到处钻。他独自去“又一顺”吃几角钱的羊肉面，拍摄一般工人的饮食情况；去照相馆拍半身照，借机了解中国摄影同行的设备、技术和对美国人的态度；去新华书店拍摄排队争购《英语九百句》课本的青年人。有时并无采访线索，全靠腿勤。例如偶然在王府井拍到了三名大学生要求和美国人民进行广泛接触的大字报。

### （五）总社指挥及时具体

他们消息很灵通，金边失守、西哈努克抵京、英萨利抵京等消息，我未宣布之前，他们就已得到总社或总分社通知。美联社看到合众国际社记者关于我和美国一个钢铁公司谈判的报道，立即来电敦促记者跟踪报道。美国各报采用乌莱维奇发回的照片很多。联想到我社有关部门往往一个季度才给分社带去一封四平八稳、时过境迁的业务信，对比之下，总社的指挥确有现代化之必要。

### （六）有计划的长期培养

罗德里克等采访所以比较得心应手，并不是偶然的。他在美联社工作四十多年，一九四五年前后在中国工作四年，其间在延安半年。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就成了“中国问题观察家”。七一年至今，他已四次来华采访，七二年美联社已内定派他驻京。乌莱维奇也学过一年半中文，能用普通话作简单会话，这次独自外出拍摄时方便不少。

无产阶级通讯社和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性质、任务是根本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工作精神、工作方法、采访和写作技巧等等，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西方记者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更应该做到并且做得更好吗？

# 美记者评论我社报道

叶志雄

年初来华采访中美建交的美国记者中，有不少熟人。在接待过程的闲谈中，他们对我社报道有不少评论。总地说，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以来我社报道出现了新气象，但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一) 认为我报道注意实事求是，讲真话了。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在首都新闻界年终招待会上，广泛接触了各国驻京记者。事后，他说：“不少驻京记者认为，现在新华社的报道信得过了。”一次，乘车路过“前三门”新建高层宿舍楼时，他幽默地说：“新华社报道过，现在我的确看到了。”

(二) 认为我文风有改进，用事实说话。《纽约时报》记者巴特菲尔德说：“新华社的报道提供事实比过去多了。我很欣赏你们近年来的调查性报道。”罗德里克说：“现在新华社的报道，尤其是通讯，读起来有趣多了。最近报道新增加三位政治局委员时，还发了他们的简历，这种做法很好。”美联社摄影记者乌莱维奇说：“反映北京市民争购报道中美建交的《人民日报》号外那张照片很好，真实、生动、自然。新华社过去一些照片比较呆板，有的又太做作，劳动时个个都带着笑脸。”

(三) 认为我开始注意时效。罗德里克说：“过去新华社消息一般要迟一天，现在一些重要报道时效大大加快了，有时还发快讯或分段发稿，新华社成了我们的竞争对手了。”他建议我社的稿尾应像各大通讯社那样，注明发稿具体时间。

(四) 认为我报道面广了。合众国际社记者克雷布说：“近一二年来，新华社报道变化很大，报道面广了，内容丰富了。”他建议新华社多发我各报版面介绍，并多转发各报独家报道和文章。

(五) 认为我报道敢于揭发坏人坏事，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罗德里克还多次提到不久前我社报道兰州某干部批评我农村工作问题一稿，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

(六) 不少记者认为，我人名、地名对外改用汉语拼音，事先宣传不够，实施过快，国外很难适应，尤其是“Q”“X”“Z”等字母的用法更使他们莫名其妙。美联社为此发来业务电，要求记者设法购买新旧拼音法对照字典。

(七) 《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秦家聪问：“既然《参考消息》(中文)不代表新华社观点，为什么不扩大发行、公开发行？为什么不让外国人和华侨看？”他说：“外电、外刊报道是非真假，读者自会判断，而且《参考消息》内容新华社已经有所选择。”

关于驻京采访问题，他也谈了一些看法。

(一) 普遍认为目前来华采访，条件大大改善了。巴特菲尔德说：“过去美国记者很难到中国采访，来了也难找人自由交谈，我们只能远远地观察，当‘中国问题观察家’。现在我们能来了，中国人也敢同外国人接触、敢说话了，因此我们可以进行真正的采访，当中国问题‘报道员’了。他说他曾在西单和一个学生交谈了三小时。后来，参观北京大学时，接

待人员没有同意临时去参观学生宿舍和餐厅，罗德里克幽默地说：“邓副总理不是强调实事求是吗？你们不必事先安排嘛！”

（二）认为有必要学中文。《新闻周刊》记者普林格尔说：“过去驻京记者很难找中国人采访，每天靠翻译读报纸标题来发掘题材。现在找人谈话容易多了，看来必须学中国话了。会讲一点北京话的乌莱维奇发现，他在街头拍摄时讲几句中国话，群众态度就格外友好，拍摄也就方便多了。”

（三）普遍认为北京应迅速建立新闻中心。外国记者可在新闻中心的电传机上，及时看到各大通讯社（包括新华社）的消息，可在那里展开官方的和记者之间的活动，可用电话、传真和长途电话及时发稿。

（四）希望提供更多采访机会。罗德里克希望我政府各部负责人多接见记者，多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设新闻秘书同外国驻京记者联系。他说：“要求我们如实报道，就需要告诉我们更多事实，免得我们作猜测性报道，弄错了。”他还说：“北京的外交礼宾活动基本上已压缩成双边活动了，这对记者采访很不利，希望今后邀请记者参加。”

（五）对采访自由心有余悸。乌莱维奇在山东淄博市附近拍了一些落后面的东西。一次，当地陪同人员没有同意他中途停车拍摄一农村集市，他误认为这是不让他拍落后面。经说明后，他连忙解释说：“我只是想两面都报道，更真实些。”罗德里克也笑着说：“我知道现在中国情形不同了，我相信格雷（前路透社驻京记者）事件、安东尼奥尼事件是不会重复了。”

## 措词不妥 应当注意

——吕叔湘同志给胡绩伟同志的信

绩伟同志：

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台湾的人口和民族”末段有一句的措词非常不妥：

“平埔族……风俗和语言都受汉族同化，因此逐渐衰落，人口也大为减少。”

原来的意思大概是这一民族受汉族同化，很多人不自认为少数民族，因此在人口统计中人数减少了。但现在的措词却使读者错误地理解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破坏性的，是促使他们衰亡的（象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那样）。虽然这里说的是台湾的情况，但是也难免对内地民族关系产生不良影响，予地方民族主义者以口实。这一段本来只要稍稍改动就没有问题：

“平埔族……风俗和语言都受汉族影响，逐渐与汉族难以区别，因而在统计人口时，这一族的人口大为减少了”。

这一条是新华社稿，但编辑加工时应当看出问题。请您向处理这一条的编辑同志指出这一点，并将我这封信转给新华社，提请他们注意。

此致

敬礼！

吕叔湘

二月十八日

（编后：由于措词不妥，形成了政治性的错误，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希望各个关口把关的同志更细心些。）

# 要 仔 细 推 敲

——从贾岛改诗想到新闻写作

新疆分社 赵昌春

新近看了不少古人治学的故事，唐人贾岛的“推敲”精神（为了把诗中“僧推月下门”改为“僧敲月下门”而煞费苦心），就很感人。

由此想到新闻写作。

贾岛不是记者，但是他的“推敲”精神是值得学习的。现在，有些同志对新闻报道缺乏严肃负责精神。且不说在逻辑、修辞上欠功夫，就连一些基本事实也不去认真了解、核对，结果造成报道失实，发生了不少“ABC”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去年十月五日四版刊登新华社的一篇通讯，题目是《铁道兵前无险阻——南疆铁路建设工地巡礼》。作者文笔流畅，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铁道兵的英雄气概，文章主流是好的。但是从新闻写作的角度看，还有不够严谨之处。

其一，以偏概全。文章一开头就说：

“从新疆吐鲁番到库尔勒全长四百七十四公里的南疆铁路，正在加紧建设中。”第一句话的头一个判断就有问题。南疆铁路是一个“总称”，吐鲁番至库尔勒只是其中一段，即第一期工程。国家现已决定，这条铁路修到库尔勒后，还要继续往前修，延伸到南疆油田和青海。目前这样报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南疆铁路就到库尔勒为止，这不符合事实。

其二，言过其实。文中说吐鲁番的夏天“地表温度高达摄氏六、七十度，如果把鸡蛋埋进沙里就会被烫熟。”这是把“传言”当成事实，渲染过火了。吐鲁番有关部门曾作过测试，鸡蛋埋进夏天最热的沙子里，蛋

白能凝固，蛋黄不太凝固，说烫熟了鸡蛋，还欠了点火候。

其三，文中说“火焰山，即克孜里塔克山”，这样解释欠妥。火焰山是汉语名称，维吾尔语叫“克孜里塔克”——意思是红山。“克孜里”是“红”，“塔克”是“山”。在“克孜里塔克”后再加“山”字，就画蛇添足了。

其四，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开都河，古时称为‘流沙河’。相传当年唐僧到西天取经路过此河时，艰难重重，巧得金龟把他背过去，回来时，又多亏神龙变作白马，才把他驮过河。”写得妙趣横生，可惜根据不充足。《西游记》二十二回即写唐僧过流沙河。那是过火焰山以前的事。现在一般人认为“流沙河”是“疏勒河”，不在新疆。在唐僧过“流沙河”一回中，也没有通讯作者写的那些故事，是作者把别的章节的故事强加到过“流沙河”上来了。另据史书记载，玄奘到天竺取经时曾经路过焉耆（开都河即在焉耆、和静等县境内），取经归来，走的是“丝绸之路”南路——塔里木盆地南缘，根本没再过焉耆。那么通讯中“神龙变白马驮唐僧过河”的情节从何而来？报刊文章中插叙点“故事”、“传说”，能引人入胜，但要有根有据。不能任意编造。

在新闻报道中，上面提到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比如《人民文学》去年第九期刊载了徐迟同志写新疆的一篇“纪游”，其中有一句话说：“今年八月一日，我正在另一边境城市，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喀什



……”这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尽人皆知，是阿图什，怎么竟成了喀什呢？！喀什是喀什地区的古城嘛！再者，“柯尔克孜”是民族名称，一般不宜用民族名字作地名称呼。若简称，最好叫地名克孜勒苏自治州。写自治州的名字应当叫全名才好。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同志写文章“不拘小节”，对某些细节的毛病很不介意，当人家指出时甚至以为是“咬文嚼字”。这是不够实事求是的表现。

真实，这是艺术的生命。真实也是新闻的生命。不真实，谁也不相信，起不到好的宣传效果。新闻的真实首先要求“新闻五要素”不能虚构，同时还应当抓住事物的本质

和主流，把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揭示出来。客观事物千差万别，错综复杂，新闻工作者要把它真实地反映出来，不是易事，这除了要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外，还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不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真实的材料。头脑是个“加工厂”。有了加工用的机器又有了充分的加工原料才能进行“加工”、“推敲”。我们一些新闻报道的差错，所以没有被发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者、编辑对所报道的情况若明若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假若编辑很熟悉有关知识和现状，上面说到的许多“破绽”就比较容易察觉了。

## 记 一 次 采 访

柳 毅

新华社二月一日播发了一篇题为《一对老夫妇的悲欢离合》的报道，讲的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胸外科专家，七十四岁的张纪正教授和华籍美国人陈必娣复婚的故事。

我们读后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适于对外报道。因此打算在此稿的基础上作一次补充采访，写一篇比较具体的对外报道。可是采访的结果却表明，公开报道写不成了。但有些情况作为参考材料写出来，也许还是有意义的。

二月十九日下午，我前往在北京外文出版局工作的陈必娣同志家中进行采访。她一见到我就说：“我们复婚已经一年多了，但至今仍然分居两地。复婚后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家庭中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你介绍。”

接着，她对有关她和张纪正复婚的新闻报道讲了一些颇为尖锐的意见。她说：“我和张纪正离婚的原因很多，不只是因为张纪

正成了右派我才和他离婚。（新华社报道说：张纪正“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张纪正和陈必娣也因此离了婚。）事实上因为张纪正男尊女卑的大男子主义思想比较严重。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意见也有分歧，因而发生口角，感情上有距离。张纪正成了右派以后，我并没有马上和他离婚，我认为他有错误，我有责任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能丢开他不管。我是在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之后，于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才提出离婚要求的，一九六四年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可是在报道里没有说清这一点，似乎是张纪正打成右派，我马上和他离婚的。”

陈必娣说，《天津日报》有一篇报道张纪正欢乐过春节的消息中，提到我今年准备和我大儿子一起去美国探亲，这也有失实之处。她说，“我将去美国是外文局组织上派我去工作，不是探亲。我在美国已没有亲人

了，我更没有准备带大儿子一块去。”她说：“记者为什么不向我了解，把情况搞确凿呢？如果单是听了张纪正的意见，这样做也太片面了。”她说：“在美国，新闻记者如果报道失实使当事人遭受损失，是要被罚款的。”

陈必娣同志还向我谈了一些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她说：“我和张纪正复婚一年多了，但是仍然分居两地。因为路途遥远，星期日无法会面。只是在一些大的节日才能团聚。张纪正的住房问题也没有解决。陈必娣今年春节去看望张纪正，只好住在朋友家里。陈必娣曾几次建议张纪正向组织提出，请求帮助，但张纪正说，这种事情比较麻烦，因而还未向领导提出。

从陈必娣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热切希望和张纪正在一起共度晚年，但因为问题至今解决不了，不免又对张纪正产生了某些误解。

最后，陈必娣提到现在我国宣传工作中有片面性。例如对美国的介绍就不全面，宣传好的方面太多了，不够真实，黑暗面没有讲。现在美国失业很严重，人民生活并不稳定。由于电视宣传不真实，许多青年人向往美国生活，她的儿子、孙子都提出要去美国学习和工作。她说在美国如没有亲友，靠年青人自己谋生是不行的。

**附原稿：**

## **通讯：一对老夫妇的悲欢离合**

**新华社天津二月一日电** 通讯：一对老夫妇的悲欢离合

在中美建交的欢庆日子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传颂着著名胸外科专家、七十四岁的老教授张纪正和华籍美国人陈必娣复婚的故事。

一九三一年，张纪正于原协和医学院毕

业，一九三七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在美国学习期间，和陈必娣相爱。一九四〇年，张纪正回国。一九四一年陈必娣也来到中国，在河北大学任教。不久两人在北京结了婚。张纪正回国后曾任协和医院胸外科主任、天津市天和医院院长等职。解放后，他们夫妇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九五〇年张纪正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医疗队，并两次参加了农村医疗队，不怕苦，不怕累，受到了人民的尊敬和欢迎，曾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他几十年一直从事医学工作，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为我国的卫生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多年来，他们夫妇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他们有三儿两女，全家过着美满的幸福生活。

然而，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一九五七年张纪正为了帮助党整风，提出现在脱产党员太多，说“共产党成了脱产党”。在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张纪正和陈必娣也因此离了婚，这个美好的家庭被拆散了。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这位老专家又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嫌”。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党委重新分析了张纪正的问题。他们认为，张纪正和美国人结婚，是允许的，他从美国回来是爱国的表现。给他扣上“特嫌”、“里通外国”等帽子，是毫无根据的。几十年来，张纪正工作积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革命知识分子，应当受到称赞，搞四个现代化需要这样的专家。

经过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党委本着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改正，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并在全院职工大会上给他平反。根据他的现实表现，决定恢复了他外科副主任的职位。

精神枷锁砸碎了，张纪正终于提出了复婚的要求。他的孩子们也多次找到医院领导，希望帮助他们重新恢复美好的家庭。医院领导热情相助，派人到陈必娣所在的外文出版局联系。这个消息传出后，许多和陈必娣一块工作的外国朋友高兴地说，“我们早就希望他俩有这一天”。经双方领导的“搭桥”，这对离婚十七年的老知识分子终于恢复了夫妻关系。

复婚仪式在北京餐厅举行的那天，整个大厅灯火辉煌。中外五十多名亲友和他们的孩子们欢聚一堂，个个笑逐颜开，喜气洋洋。这对老夫妇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异口

同声地说，只有打倒“四人帮”，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这对老夫妇才能重新恢复夫妻关系，他们全家才能得到团聚。一位美国朋友拉着医院负责人的手激动地说，“你们做得好极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们，让我们共同干杯！”

党的关怀，更加激发了这位老教授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向党组织表示：“要尽晚年之力，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最近，他正在制定新的科研计划，着手总结治疗肺癌的学术论文。

新华社记者 孙永盛

## 肃清“帮八股”流毒何其难

丁世义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发的新闻、通讯、短评等，不仅内容好，在文风方面，也有很大改进。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八股式的写法仍时有流露，不仅读者生厌，我们这些作编辑工作的也感到很头痛。

读者对一般化的文章可以不看，而编辑却不行，非得硬着头皮看下去不可。我劝同志们耐心一点，读读下面这两个长句子：

“在学习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同时，××自治区党校认真组织这批公社书记学习经济理论，掌握按照客观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的本领。他们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为武器，联系当前干部工作和思想实际，结合学习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着重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按劳分配、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价值规律等三方面的问题。”

这原来是一个将近二百字的“小导语”

（如果非要不可，也得大大简化）。令人难办的是，它还引出了三句更长的话，摘引如下：

“一是针对一些社队在劳动计酬上的‘一锅煮’，在分配问题上的‘一拉平’，和部分干部怕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重犯路线错误’的不正常现象和糊涂观念，引导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科学理论，摆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会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谬论所带来的严重恶果，深刻认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条客观规律，是调动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加快农业发展步伐的重要决策。二是针对社会上一度出现的‘各行各业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角’和任意侵犯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的不正常现象，引导大家认真学习党中央有关人民公社的性质、管理体制的科学论断，摆林彪、‘四人帮’混淆两种所有制界限，以假左真右的反

革命手法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灾难，深刻认识保护公社、大队、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大问题。三是针对一些社队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益、经济效率、经济责任，出现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的现状，引导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规律的论述，摆林彪、“四人帮”否认价值规律作用所造成经济管理的混乱，深刻认识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说，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第一句话，二百一十五个字，第二句话是二百一十八个字，第三句话也有一百一十三个字。三句话共有五百四十六个字。每一句话用一两口气是读不完的。就是硬着头皮读完了，也是读到后头忘了前头。这种“论文”式的句式，不仅句子长，结构也一个样。第一句是“针对……，学习……，认识到……”；第二句、第三句也是这样。我们反对必要的长句。但是这些长句太一般化、概念化，有不少是地地道道的套话。从

内容上看，如果像记者说的那样，参加党校学习的公社党委书记们，只要结合什么，学习什么，就认识了什么什么，那么这样推论下去，岂不有点像林彪鼓吹的“立竿见影”了吗？我不是戴大帽子。记者同志本来也没有这种意思，我是说这种冗长的泛泛的套话不能确切地生动地反映具体内容，言而无新意，使人摸不到要领。这不仅是新闻的大忌，即使是文章也不能这样写。

这种不好的文风为什么这样难改。这是因为帮八股的流毒太深，使有些同志中毒而不知毒。其次，有些同志写新闻、通讯，不是深入分析客观事物，然后加以概括、提炼，而是满足于罗列表面现象，在那里“开中药铺”，硬“做”文章。因此不能不形成长而空的大杂烩。一条消息动辄四、五千字，靠套话、空话来“充实”内容，这怎么能叫人读得下去？此稿原稿共四千五百字，新华社播发稿用了一千四百字，《人民日报》刊登出来，只采用了四百字。

我们一定要肃清帮八股的流毒，发扬准确、鲜明、生动的革命文风，使我们的报道发挥更大的作用。

## 继续沿用“第几次、第几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是否恰当

《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三版《在实践中考察选拔干部》一稿中，讲到考察干部特别要看“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表现”。次日报纸上又出现了“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这种提法是否妥当？

关于党内路线斗争，据我们所知，建国以前，是党中央、毛主席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

线斗争（至于与罗章龙、瞿秋白路线斗争的内容直到现在我们基层党员、干部还不知道）；建国以后，有同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后来听说在庐山会议上又有同彭德怀等同志的“路线斗争”，并且列为“第八次”。那么，现在，报纸上已经公开为彭德怀同志恢复名誉，再说这次是“第八次路线斗争”显然是不实求是了。因此党内总共有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我们认为，把党内路线斗争排列为“第几次、第几次”，也是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一个重大问题。所以，建议以后直接了当地提斗争的内容，而不提多少次。

（来信摘要）